

拉美政治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 历史背景、发展和展望

[哥伦比亚] 莉娜·卢纳

内容提要：持续 50 多年之久的武装冲突给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了国内社会的分裂和脆弱。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土地斗争，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包括多个游击队组织（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使得武装冲突形势异常复杂，延宕日久。在桑托斯政府之前进行的历次谈判都未能真正解决武装冲突，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者，其中多数是平民。直到 2016 年桑托斯政府才真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和平协议内容包括综合农业发展政策、游击队解除武装后的政治参与权利、游击队成员融入平民生活、贩毒问题的解决以及受害者赔偿五大方面。然而，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并将影响 2018 年总统选举结果以及国家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展望未来，哥伦比亚和平建设道路漫长而艰辛。

关键词：桑托斯政府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武装冲突
游击队 和平协议

作者简介：莉娜·卢纳（Lina Luna），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博士
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7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17) 06 - 0056 - 16

哥伦比亚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几乎在所有历史阶段，国内都存在武装冲突。当前的武装冲突已经持续 50 多年，其成本无法通过一个维度进行衡量：除了经济成本（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经济成本太大）之外，还有不可估量的物质、环境、政治成本。武装冲突导致受害者达 800 多万人，哥伦比亚社会成为一个分裂、脆弱的社会，未来的和平建设道路艰辛而漫长。为了理解桑托斯总统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所签署和平协议的复杂性、挑战和意义以及该协议对哥伦比亚社会的影响，必须回顾相关行为体的起源和性质、冲突演变的方式、受害者的数量以及之前失败的和平谈判尝试。

一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

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根源有多种解释，其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根源是土地斗争，也有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美国因素或古巴革命影响的结果。哥伦比亚武装冲突涉及众多行为体，包括多个不同的游击队组织（特别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使得武装冲突形势异常复杂，延宕日久。武装冲突中游击队活动经历了停滞和边缘化阶段、领土扩张和活动增强阶段、战略退出和失败阶段，最后迎来了和平进程阶段。

（一）武装冲突的根源

在哥伦比亚，一系列冲突以“链条状”的形式接连出现：前一阶段冲突的结束标志着下一阶段冲突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目前冲突的根源和原因，学界并没有一致的观点，不同专家依照不同视角作出多种解释，而每种解释都有其道理。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哈瓦那和平对话于 2014 年 8 月成立“武装冲突和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不同领域人士选举出的 12 名专家和 2 名记录员组成，以便争取将各种观点都纳入委员会中。该委员会的使命是“针对关于武装冲突的根源和起因、造成冲突持续存在的主要因素和条件以及对人民造成的恶劣影响，提交一份调查报告”^①。

关于武装冲突的根源，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上述委员会成员在报告中提到了多个决定性因素，其中，普遍认可的因素是土地斗争，这是政府和农民

^① Comisión Histórica del Conflicto y sus Víctimas, *Contribución al Entendimiento del Conflicto Armado y sus Víctimas*, Bogotá: Desde abajo, 2015.

之间冲突的触发点^①。土地问题是理解冲突的根本轴心，因为是否拥有土地，与三个基本必需品——住房、粮食和劳动/收入直接相关^②。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这些需求，民众的斗争权利便是合法的，最严重的便是出现暴动。除了土地冲突之外，委员会报告中也提到了其他原因：资本主义在哥伦比亚占主导地位，阶级斗争导致武装冲突和暴动。一些委员会成员甚至认为，美国在哥伦比亚的角色也是导致冲突的因素之一，此外，古巴革命的影响以及共产主义的扩张导致游击队的形成。总的来说，一些结构性因素，如政府对某些地区的长期忽略，也是导致武装冲突的原因。^③

鉴于这些原因，学界尚未对哥伦比亚目前的武装冲突的起源达成共识。在报告中，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④认为，武装冲突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土地斗争。第二种观点^⑤认为，武装冲突始于全国阵线政府之后^⑥，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贩毒活动兴起时才产生了武装冲突。虽然武装冲突继承了“暴力时代”党派之间暴力冲突的特征，但是当前武装冲突的行为体、潜在逻辑和主要原因都产生于全国阵线政府之后。第三种观点^⑦认为，武装冲突始于“暴力时代”，因为在该时期产生了武装农民组织^⑧。

（二）武装冲突中的行为体

如前文所述，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复杂性还在于涉及的行为体众多，主要行为体包括游击队、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

① D. Fajardo, “Estudio Sobre los Orígenes del Conflicto Social Armado, Razones para su Persistencia y sus Efectos más Profundos en la Sociedad Colombiana”, en Comisión Histórica del Conflicto y sus Víctimas, *Contribución al Entendimiento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Bogotá: Desde abajo, 2015, pp. 361–421.

② J. Giraldo Moreno, “Aportes Sobre el Origen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su Persistencia y sus Impactos”, en Comisión Histórica del Conflicto y sus Víctimas, *Contribución al Entendimiento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Bogotá: Desde abajo, 2015, pp. 423–470.

③ El Heraldo, “Las Teorías del Origen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18 de Febrero de 2015. <https://www.elheraldo.co/politica>. [2017-02-25]

④ 委员会成员 Sergio de Zubiría、Javier Giraldo 和 Julio Estrada 的观点与此观点一致。

⑤ 委员会成员 Jorge Giraldo、Francisco Gutierrez Sanfín、Gustavo Duncan 和 Vicente Torrijos 的观点与此观点一致。

⑥ 1948—1960 年期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该时期被称为“暴力时代”。内战发生的原因是农民、地主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自由党总统候选人盖坦（Jorge Eliecer Gaitán）被暗杀导致当时两大传统政党即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暴力战争，战争不仅影响了农村地区，也影响了城市地区。为了结束党派冲突，后来哥伦比亚宣告成立全国阵线，规定两党候选人轮流担任总统，每届政府任期为4年。

⑦ 法国历史学家皮考特（Daniel Pecaute）和社会学家莫拉诺（Alfredo Molano）持此观点。

⑧ El Heraldo, “Las Teorías del Origen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18 de Febrero de 2015. <https://www.elheraldo.co/politica>. [2017-02-25]

游击队。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涉及第一代和第二代游击队。第一代游击队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成立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民族解放军（ELN）和人民解放军（EPL）。他们产生于深受“暴力时代”之苦的武装农民或青年组织之中，并且深受古巴和中国的革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切·格瓦拉等人物的鼓舞^①。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立于 1965 年，最初是党派游击队，被认为是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武装延续。80 年代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始通过贩毒来资助游击活动，目前成为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民族解放军成立于 1962 年，其初衷是打破以政党为中心的传统治国框架，试图以游击队为核心，创立一种新的政治—军事组织结构。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对石油工业相关领域进行勒索。民族解放军的规模逊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但如果后者放弃武力，民族解放军将会是该国唯一的游击队，因为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还未与之达成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成立于 1967 年，他们一直试图将农民作为其支持基础，认为农村斗争是长期的人民战争。第二代游击队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包括多个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月十九日运动”（M19）、金庭·拉梅武装运动（Quintin Lame）、自由祖国运动（Movimiento Patria Libre）、革命工人党（PRT）等。这些组织目前均已解散。^②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准军事组织或自卫组织是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最有争议、不可定义的暴力行为体。这类组织产生于 1981 年，当时的名称是“绑匪去死”（MAS），是一些大地主为了抵御游击队的敲诈勒索而成立。后来该组织发生了重大改变。从 1989 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他们“分裂”成几个小团体，1995 年经历了增长和扩张，1997 年又重新聚合在一起（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接受卡洛斯·加斯塔诺的领导并改名为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③ 2003 年，他们宣布与乌里韦政府休战，本应在 2005 年放弃武装斗争，但人们对于其放弃武装斗争的进程仍然存在质疑，因为他们现在以独立武装犯罪团伙的形式复出，在那些非法古柯贸易和贩毒活动集中的省份中活动。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最终变成了寻求通过贩毒和勒索来暴富的武装

^① Centro Nacional de Memoria Histórica, “¡Basta Ya! Colombia: Memorias de Guerra y Dignidad”, Bogotá, 2013. <http://www.centrodememorialhistorica.gov.co/micrositios/informeGeneral/index.html>. [2017 - 02 - 25]

^② C. Echandía, “50 Años de Cambios en el Conflicto Armado Colombiano (1964 - 2014)”,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3, 2014, pp. 94 - 101.

^③ C. Luna (L. Luna, Entrevistador), “Sobre Actores y Desarrollo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28 de Febrero de 2017.

犯罪组织。事实上，正义与和平法庭在2017年判定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人的杀手团体，他们的领导人致力于犯罪行为。这引起了人们对该团体遣散进程的质疑。为此，哥伦比亚政府签署了《正义与和平法》，计划用960天完成对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全面遣散。显然，此举没有达成效果，因为他们仍然继续作为犯罪团伙实施犯罪行为。^①

贩毒集团。可以说，贩毒集团是武装冲突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鉴于冲突的变化和贩毒人员的变化，现在还不能明确各个贩毒卡特尔的名称。贩毒这种非法业务对武装冲突的发展和长期存在至关重要，因为它至少是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资金来源^②。毒品贩运路线以及毒品作物种植区是武装冲突的轴心，这导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之间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为了争取毒品的生产和运输的控制权而斗争。由于这些对抗只发生在毒品生产和贩运有关地区，这就明确了这些行为体的利益所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存在于哥伦比亚多个区域，不仅仅在古柯生产地区，但是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只在毒品种植地区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产生冲突。这表明，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斗争背后并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冲突，他们只是为了寻求对毒品交易的控制权。贩毒就是该组织存在的原因，而不是他们自己声称的“打击游击队”。

总的来说，贩毒活动在武装冲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贩毒是冲突行为体持久存在的生存手段，也是冲突本身持久存在的原因。贩毒活动还是最具暴力的行为体——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存在的原因。^③

（三）武装冲突的各个阶段

哥伦比亚游击队的武装冲突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停滞和边缘化阶段，第二阶段是领土扩张和活动增强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退出和失败阶段^④，第四阶段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进程阶段。

1. 停滞和边缘化阶段（1964—1981年）。这是不同游击队开始形成的时期，其性质和意识形态如前文所述。在这段时间，游击队主要停留在发源地，

^① J. D. Laverde, “Autodefensas no, Franquicias de Matones. El Espectador”, 11 de junio de 2017. <http://colombia2020.elespectador.com/pais>. [2017-06-11]

^{②③} C. Luna (L. Luna, Entrevistador), “Sobre Actores y Desarrollo del Conflicto Armado en Colombia”, 28 de Febrero de 2017.

^④ C. Echandía, “50 Años de Cambios en el Conflicto Armado Colombiano (1964 - 2014)”,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3, 2014, pp. 94 - 101.

也没有招募到大量成员，甚至在军事上几乎即将被打败。20世纪80年代是古柯繁荣期，由于有了新的资金来源、新的行为体和动力，武装冲突开启了一个阶段^①。

2. 领土扩张和活动增强阶段（1982—2002年）。20世纪80年代初，“四月十九日运动”（M19）是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在此期间也开始了强有力的领土扩张。有人认为，正是由于贝坦库尔总统（Belisario Betancur，1982—1986年）发起的和平进程，导致游击队员采取了新的战略，并通过贩毒等活动获得了新的资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决定扩大势力，寻求在各个省份都建立起战线，部署在波哥大周围。这一战略几乎完全实现了，他们一方面与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另一方面利用其掌控的古柯资源获得更多资金来源，使其战斗力大大增加。^②民族解放军也决定扩大势力，但他们原则上拒绝利用贩毒作为资金来源，因为这违反其意识形态。民族解放军对石油勘探区进行剥削和勒索，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勒索跨国公司获得的资金用于哥伦比亚正义之战是公平的。民族解放军利用和平进程来扩大势力，特别是扩大了在农工业发达地区的势力。^③

总的来说，各个游击队都在这个时期加强和扩大了势力，并扩展了资金来源，但同时他们遇到了新的敌人——自卫团体和准军事组织，他们之间相互争夺毒品作物的种植区。虽然民族解放军在1985年左右势力扩张迅速，但在90年代，由于与自卫团体和准军事组织的冲突，再加上来自政府的压力和其他战略性错误，其扩张速度受阻。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是1999年帕斯特拉纳总统划出一片非军事区，表明其巩固和平进程的意愿，但和平进程却未因此得到巩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1981年以来一直采取增强自己势力的战略。不同的是，这次帕斯特拉纳总统也战略性地利用了这一契机，对政府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扩大和加强，这对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后来的战略失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3. 战略退出和失败阶段（2003—2014年）。帕斯特拉纳总统发起的军队现代化改造举措在继任的乌里韦政府时期得以继续实施，该举措使得政府军队实力大大增强，导致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略失败。在帕斯特拉纳总统执政末期，他就已开始在游击队势力集中的战略地区攻击游击队。后来，

^{①②③} C. Echandía, “50 Años de Cambios en el Conflicto Armado Colombiano (1964 - 2014)”,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3, 2014, pp. 94 - 101.

乌里韦总统着力巩固军事优势，旨在彻底击败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别无选择，只能撤退。撤退战略使他们得以生存下去，但他们无法重新统一，也无法继续加强势力。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势力的削弱显而易见，自那时起他们没能够发动一次重大反攻，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但应该指出的是，乌里韦总统也无法在军事上将其完全击败。^①

这个节点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使得双方巩固了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愿，这是冲突的第四个阶段。在回顾了各种和平谈判尝试之后，下面我们将分析第四个阶段的冲突与和谈情况。

二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

前面介绍了哥伦比亚武装冲突的前三个阶段，下面介绍第四个阶段即和平进程阶段。在桑托斯政府之前进行的历次谈判中，武装冲突都没能得到真正解决，冲突导致了大量受害者，其中多数是平民。直到2016年桑托斯政府才真正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和平协议，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然而，围绕和平协议的争议还在继续，并将影响2018年总统选举结果。

（一）哥伦比亚和平谈判历史

桑托斯政府之前的历届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和平谈判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双方最基本的不可兼容性难以调和：政府谈判的目标是消除武装冲突，而游击队的目标是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②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当前的和平谈判之前，在武装冲突的历史上有三个重要的谈判时期。

1. 贝坦库尔政府（1981—1986年）和巴尔科政府（1986—1990年）时期

在1981年由贝坦库尔总统领导的和平进程中，政府提出停火作为实现和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游击队在战术上利用了这一停火协议来推进其目标，训练、招募、重组和加强了游击队势力。作为这一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成立

^① C. Echandía, “50 Años de Cambios en el Conflicto Armado Colombiano (1964 - 2014)”,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3, 2014, pp. 94 - 101.

^② C. Echandía, “De la Uribe a la Habana: Un Largo Recorrido en Busca de la Paz en Colombia”,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0, 2013, pp. 36 - 43.

了爱国联盟（UP），该联盟是一个争取从武装斗争向政治转变的政党。贝坦库尔总统卸任之后，巴尔科总统试图维持和平谈判，但1987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暴力行为导致谈判崩溃。在此期间，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爱国联盟在农村地区获得了较高的民众接受度，并开始赢得地方选举，这导致多个部门的不满。一方面，传统政治家认为这个政党的出现意味着政坛上产生了一个不必要的新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军方也对爱国联盟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最终仍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种形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完全遣散，反而同时拥有了一条“政治”臂膀和一条“武装斗争”的臂膀。另外，主要贩毒集团，特别是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和伽查（Rodríguez Gacha）等，作为新的大地主，认为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威胁其贩毒活动的竞争者。因此，这些“敌人”共同围捕和暗杀爱国联盟的成员。^① 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政府必须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保证，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和平参政，不会发生爱国联盟类似的遭遇。

除民族解放军之外，1989年所有游击队都表示愿意为冲突寻求政治解决办法。“四月十九日运动”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后来开始解散。当时盛行着一股强烈的寻求和平的风气，但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对平民的行动破坏了这一进程。即使如此，由于政府承诺进行修宪公投，1990年金庭·拉梅武装运动和其他第二代游击队均开始了解散之路。^②

2. 加维里亚政府（1990—1994年）和桑佩尔政府（1994—1998年）时期

虽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冲突升级活动，1991年，革命工人党、人民解放军和金庭·拉梅武装运动等组织纷纷解散。1991年，政府开始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温贝托·德拉卡耶（Humberto de la Calle）任政府代表，阿方索·卡诺任游击队的代表。然而，德拉卡耶认为，游击队显然并不想结束武装冲突，而是希望通过谈判改变哥伦比亚的国家制度。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继续绑架人质、破坏国家基础设施和实施其他颠覆行动，导致和平谈判破裂。更强大的国家军队则开始用更多力量来攻击游击队。由于“四月十九日运动”和其他游击队的解散，哥伦比亚革命武

^{①②} C. Echandía, “De la Uribe a la Habana: Un Largo Recorrido en Busca de la Paz en Colombia”,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0, 2013, pp. 36–43.

装力量成为国内最大的游击队。桑佩尔总统（Ernesto Samper）竞选资金丑闻引起了本国人民的愤怒并受到国际谴责，但他拒绝辞职。虽然桑佩尔总统尝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谈判，但后者宣称政府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合法性与他们谈判，他们仍然继续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与政府军队抗衡。^①

3. 帕斯特拉纳政府（1998—2002年）和乌里韦政府（2002—2010年）时期

帕斯特拉纳总统执政期间，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没有真正达成和平谈判。帕斯特拉纳之所以当选总统，正是因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当时表示会与他进行和平谈判。政府建立了一个停战区，在1999年生效，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真正意图是利用停战区和停止敌对行动来加强自己的势力，就像在1981年贝坦库尔总统执政期间那样，这也是他们甚至没有出席谈判的原因^②。但这次谈判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也在战略上利用这一局面加强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缺乏谈判意愿，使其在国家 and 世界眼中成为非法组织，这为政府使用武力攻击他们提供了理由。在帕斯特拉纳执政末期，谈判已经破裂。强大的国家军队开始加大武力直接攻击游击队力量集中的地区。

游击队对帕斯特拉纳总统建立和平意愿的“无礼”回应，使得哥伦比亚人民十分愤慨，因此，哥伦比亚人决定选出一个承诺攻击和结束游击队的总统。新任乌里韦总统拥有实力强大的军队和人民的支持，因此他大大增加了战争预算，致力于大力攻击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别无选择，只好撤退以求生存。尽管乌里韦在8年执政期内并未能在军事上击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但是大大削弱了其势力，巩固了政府军队相对于游击队的优势，也让后者意识到和平谈判是唯一的出路。

（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在分析桑托斯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平进程之前，必须回顾一下最棘手的问题，也就是武装冲突必须结束的根本原因：受害者问题。如同所有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中，民间社会受到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本文开头所述，武装冲突对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哥伦比亚要建立一个真正和平的国家，必须付出

^{①②} C. Echandía, “De la Uribe a la Habana: Un Largo Recorrido en Busca de la Paz en Colombia”,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0, 2013, pp. 36–43.

长期、巨大的努力。

武装冲突在农村地区蔓延的主要受害者是农民以及土著民族。根据哥伦比亚国家历史记忆中心（GMH）编写的报告《够了！哥伦比亚：战争与尊严的记忆》，截至2013年3月31日，武装冲突死亡人数达22万人，其中，81.5%为平民，18.5%为武装分子。这意味着不同战线的武装分子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如此激烈，但却导致了对民间社会的系统性攻击。该国1/3的暴力事件是武装冲突的后果，每一个武装分子的死亡都伴随着4名平民死亡。如果考虑到4起凶杀案中有3起并没有包括在统计数据之内，死亡数据可能要高得多。^①

关于非致命性受害者，截至2013年3月，共有25007名失踪人员，1754名性暴力受害者，6421名儿童被招募，4744046人流离失所（占哥伦比亚总人口的15%），27023人被绑架，10189人因地雷受伤。截至2013年，哥伦比亚因地雷遇难的人口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阿富汗。幸运的是，2017年哥伦比亚终于摆脱了这个排名。迄今为止，哥伦比亚也是世界上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国家。^②

必须指出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间社会才开始受到直接的攻击（见图1）。这恰好是出现准军事组织或自卫团体的时期以及毒品繁荣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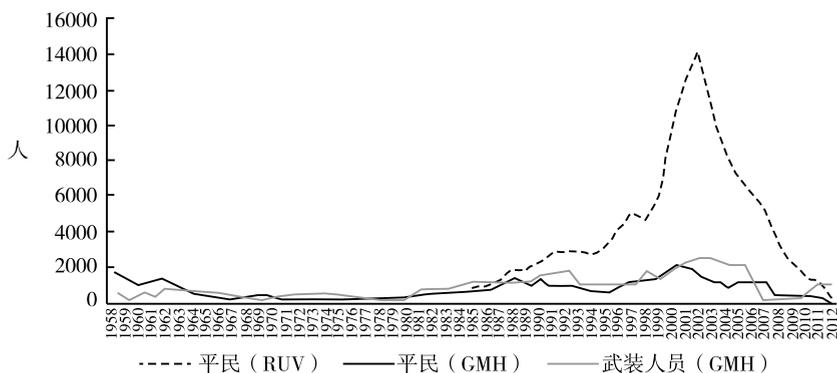


图1 在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死亡的平民和武装人员人数（1958—2012年）

资料来源：根据哥伦比亚国家信息网络受害者唯一登记处（RUV，数据更新至2013年3月31日）和国家历史记忆中心（GMH）数据绘制。<http://www.centrodememoriahistorica.gov.co>. [2017-06-21]; <http://mi.unidadvictimas.gov.co/RUV>. [2017-06-21]

^{①②} Centro Nacional de Memoria Histórica, “¡Basta Ya! Colombia: Memorias de Guerra y Dignidad”, Bogotá, 2013. <http://www.centrodememoriahistorica.gov.co/micrositios/informeGeneral/index.html>. [2017-02-25]

准军事组织或自卫团体制造了迄今为止大约 60% 的屠杀案，他们是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大多数平民受害者的主要凶手。尽管准军事组织或自卫团体比传统游击队晚出现 20 年，并且在 2005 年乌里韦政府执政期间已经宣布“解散”，但今天仍然作为新形式的犯罪团伙，继续扰乱国内治安。根据哥伦比亚国家信息网络受害者唯一登记处（RUV）的数据，到 2017 年共有 8421627 名受害者。因此，目前哥伦比亚社会是一个分裂且充满怨恨的社会，整个社会都是武装冲突的牺牲者。

（三）桑托斯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平进程

对和平进程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如下两点。首先，过去的历届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谈判的尝试，因为 2016 年结束的和平谈判反映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政府在谈判中汲取了以往的一系列经验教训，以结束与游击队的军事对抗，并避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再次利用和平谈判加强自己的势力。因此，不同于帕斯特拉纳总统执政期建立“停战区”的做法，这次和平谈判中并没有建立非军事化的停战区，谈判的出发点也不是停火。这次谈判在议程中确立了众多议题，并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对话，如同巴尔科政府和加维里亚政府曾分别在墨西哥的特拉斯卡拉和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与反政府武装力量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其次，对和平进程的分析不能脱离武装冲突的动态，以便更好地理解为何在哈瓦那进行的和平谈判能够圆满结束。这次和平进程与前几次相比的主要区别是，这次政府军队相对于游击队而言拥有军事优势，而游击队在军事力量、领土面积、战斗人员数量和经济基础等各方面都明显处于弱势。^①

桑托斯总统执政两年后开始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进行探索性对话。和平对话在哈瓦那举行，第一阶段是秘密进行的，旨在确定谈判路线图，来结束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2012 年 9 月 4 日，桑托斯政府证实，和平对话成功进行，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的和平的总体协议》（简称《总协议》）。这份协议决定了谈判所依据的路线图、议程、阶段和原则。谈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探索性对话，在《总协议》签署之后结束。第二阶段是直接工作会议，双方商讨议程上的各个事项，以便制定结束冲突的最终协议。如果第二阶段获得

^① E. Bechara (L. Luna, Entrevistador), “Análisis del Proceso de Paz con las FARC en Colombia”, 6 de marzo de 2017.

成功，则进入第三阶段，即协议的确认、批准和实施。谈判原则是“直到所有内容都达成一致之前，任何内容都不算商定”，政府强调在谈判中不会停止对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也不会建立任何“非军事区”。^①

本次谈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与过去的差异，特别是政府方面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不签订停火协议或给予游击队“停战区”，这两个因素曾帮助游击队策略性地利用和平谈判过程来巩固自身实力。其次，政府同意在议程中列入农村综合改革问题，因为农村问题始终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的理由。而以前，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唯一目的是结束冲突，这也是前几次谈判尝试均失败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关于受害者赔偿问题，这是和平谈判第一次考虑到受害者，双方商议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谈判议程表明，双方愿意按照《总协议》的规定建立稳定持久的和平。

（四）谈判议程的五方面内容

双方围绕议程上的五方面内容进行了谈判，并于2016年最终达成协议。

1. 综合农业发展政策。综合农业发展政策包括了14点计划，旨在通过国家土地基金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并支持农民实现团结经济、获取信贷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保证由国家向农民提供健康、教育和安保服务。^②

2. 政治参与。对于公民和反对者来说，这是最受争议的一点。除了保证受武装冲突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能参与政治之外，还就成立反对派进行了谈判，以便让反对派可以发表意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社会领袖和新政治家的安全，以防再次出现类似爱国联盟的悲剧，确保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斗争方式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③。因此，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将成立一个与传统政党地位相同的政党，并保证他们在国会中享有至少一定数量的席位，以便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提案和观点。这一点在谈判中至关重要，如果无法保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其理想，他们绝不会放下武器。

3. 结束武装冲突。从以前哥伦比亚实现和平的努力中可以看出，游击队从没有考虑真正结束武装冲突。2016年6月23日，双方就结束冲突的步骤进

^① E. Bechara, “El Péndulo de la Paz y la Guerra en Colombia en el Gobierno Santos: ¿de Espaldas a la Guerra o de Cara a la Paz?” en *Revista Zero*, Edición 31, 2013, pp. 44–49.

^{②③}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El Acuerdo. Obtenido de Acuerdo de Paz”, 11 de Marzo de 2017. <http://www.acuerdodepaz.gov.co/el-acuerdo-de-paz>. [2017-06-22]

行了谈判，规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将聚集到22个“安全区”和6个营地中，从那里重新融入平民生活。另外还规定该组织将分期分批将武器上缴给联合国，并于2017年6月最终完成武器交付。^①同时，还规定了帮助该组织成员融入平民生活的多项机制。

4. 非法贩毒问题的解决。解决非法贩毒问题至关重要。如前文所述，贩毒活动在哥伦比亚武装冲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约定，解散后的游击队员将与农民携手合作清除非法作物，并帮助农民家庭从事合法种植活动来维持生计。这与第一点规定的农业发展政策有关，也是一些犯过轻度罪行的武装人员服刑的一种方式，他们将通过劳动来服刑而不是被监禁。另外，政府将坚决打击非法贩毒集团，发起强有力的打击贩毒活动。

5. 赔偿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这是和平协议的基本轴线，围绕受害者赔偿问题，建立了真相、正义、赔偿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制度，并成立和平特别法庭（JEP）。这是一个基于尊重武装冲突受害者权利的协议，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是最终协议的核心。受害者不仅将通过司法程序，还将通过一个真相委员会和一个专门负责寻找在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部门，获知他们的亲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受害者将得到补偿，政府将保证游击队的罪行不会再次重演，这不仅是因为武装冲突的结束，而且是因为真相将被揭露，正义将会回归。这是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游击队第一次同意在国家法院面前对其罪行指控做出回应。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将受到惩罚，并且必须赔偿受害者。这是一个正义的协议，罪犯必须说明所有事实真相、赔偿受害者、确保不再犯罪，并将被判处5~8年监禁。另外，还规定了惩治犯人的其他措施，如协助建设基础设施、人道主义排雷、帮助寻找失踪者；隐瞒罪行者最高可获20年监禁。此举是为了确保在武装冲突中犯下的罪行永远不再重复，受害者可以得到完全赔偿。^②

（五）全民公投

通过和平协议时，哥伦比亚人对于全民公投的意见明显分成两派。全民公投时的辩论持续至今，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2018年总统选举以及国家的未来和协议的执行情况，因此，必须分析决定公投结果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①②}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El Acuerdo. Obtenido de Acuerdo de Paz”, 11 de Marzo de 2017. <http://www.acuerdodepaz.gov.co/el-acuerdo-de-paz>. [2017-06-22]

乌里韦总统成功修订了哥伦比亚宪法并获得连任，成为该国第一位连续执政两个任期的总统。在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时，他试图再次获得连任，但这一次没有得到批准。桑托斯总统是乌里韦执政时的国防部长，他赢得2010年选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会延续乌里韦总统的政策。然而，桑托斯执政后不久，他推动实施的政策和法律显然与乌里韦不同。因此，桑托斯和乌里韦之间本来是联盟，却变成了持续至今的强烈对峙。

应该强调的是，随着武装冲突时间的延宕，冲突已经渗透到政治领域，造成了政府领导人、公职人员与武装冲突分子之间存在机会主义关系的危险局面。更糟糕的是，这些公职人员已经成为一个派系，他们承认武装分子对其武力控制的领土具有管辖权。和平特别法庭和真相委员会的机制旨在对所有罪行进行彻底调查，确定犯罪事实并对其进行审判。这牵涉到作为武装冲突的行为体之一的政府及其官员。因此，政府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强烈反对冲突的和平解决：一些人担心自己被调查，另一些人认为达成的和平协议不完全令人满意，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击溃游击队，而不接受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持后一种观点的领导人就是前总统以及现任参议员乌里韦。

因此，在2014年桑托斯寻求连任的政治运动中，乌里韦支持他的新政党“民主中心党”的另一位候选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辩论的焦点在于：如果支持和平谈判，就投桑托斯的票，如果支持继续战争，则支持乌里韦提出的总统候选人。从那时起，乌里韦开始宣传一种关于为何要与游击队签署和平协议的被曲解的观点：如果与游击队签订和平协议，共产主义就会主宰哥伦比亚，导致该国走向一个可怕的未来。尽管如此，桑托斯还是成功地再次当选总统，这反映了大多数哥伦比亚人希望看到政府实现与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和平进程。

为了安抚乌里韦，桑托斯总统决定，如果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和平协议，就会进行全民公投，使协议更具合法性，并将再次向国民承诺重建和平。从法律上看，全民公投是没有必要的，这只是桑托斯的意愿。和平协议获得通过必须赢得不低于13%的赞成票，且必须超过反对票数。在谈判过程中，桑托斯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多次邀请前总统乌里韦及其领导的“民主中心党”参与，以便他们了解谈判内容并加入谈判进程。然而，乌里韦与其政党成员坚决拒绝参与。全民公投结束后，乌里韦将利用反对和平协议的旗帜作为即将到来的2018年总统选举的政治手段。

全民公投计划于2016年10月2日进行，即9月26日在卡塔赫纳正式签

署和平协议后几天。乌里韦成为反对派的领导人，他反对通过和平协议。应该指出的是，乌里韦是哥伦比亚政治中有争议的人物。在两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他仍然试图继续连任。他和他的大部分内阁成员卷入多起犯罪案件调查，包括腐败案、支持准军事集团案、“伪造行动”丑闻及危害人类罪等，因此很多民众反对乌里韦。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乌里韦总统一直以强硬姿态对付游击队，这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国家的安全状况，所以他也保持了较高的公民支持率。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全民公投中“反对”派胜利的背后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所有的调查都显示“赞成”派将胜出，因此近60%的选民没有前往投票。另一方面，“反对”派制造了很多歪曲的言论，正如其领导人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 Vélez）在《共和国报》的采访中承认，“反对”派宣传“和平即意味着哥伦比亚灭亡”的观点，甚至称和平协议的背后是“性别意识”，将使得同性恋在全国范围流行，这就是为什么不少教会牧师提倡信徒投反对票。此次公投不仅是为了和平而投票，大多数人的投票意味着其支持的是桑托斯还是乌里韦。

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登记册的数据，通过和平协议所需的最低票数已经得到了满足，而“反对”和“赞成”的票数分别50.22%和49.77%，差异非常小。随后，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反对派进行了会面，听取了他们的建议，并对初步协议进行了修改。由于初步协议已经获得批准，政府决定不再进行第二次全民公投，而是在国会进行批准。2016年12月2日，和平协议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开始生效实施，意味着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正式结束。

三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展望

虽然本文没有提及国际社会的支持，但应该指出，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发展和巩固至关重要。很大部分后冲突时代的建设资金来自国际社会。同样，虽然全民公投失败，但是诺贝尔和平奖仍然颁发给了桑托斯，这是国际社会对这一进程坚定的支持信号。展望未来，鉴于哥伦比亚国内对于这份和平协议的观点仍处于分裂状态，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对《总协议》的支持对于确保协议的执行至关重要。

结束与哥伦比亚最大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武装冲突是

建设和平的重要一步。和平谈判过程已经持续了很久，而且情况非常复杂。和平协议的达成只是该国走向终极和平漫长道路的开始。在短期内，今后和平建设将取决于以下几点。

一方面，和平协议的实施结果将取决于诸多因素：和平进程中人民的信任；与民族解放军的和平谈判；确保和平是稳定和持久的，而不是另一场武装冲突开始。2017年6月，虽然和平协议开始执行，但是在临时过渡区的建设和改造方面都出现了延迟的情况，武器的上缴也出现一些延迟（尽管联合国确认武器上缴过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将很快完成）。最重要的是，和平特别法庭是否正常运行、受害者是否能够得到补偿、正义是否能够得到伸张，这些对于保证冲突不再重演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和平过渡阶段非常复杂。50年来，武装冲突掩盖了国内存在的诸多不平等问题、非法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武装冲突这一借口不再适用，这些重大矛盾开始凸显。由于哥伦比亚民众并不一定明白其中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与和平进程无关，所以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和平进程。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特别是2018年的总统选举即将来临，大部分辩论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例如，乌里韦所属党派的候选人已经表示希望修改甚至不承认和平协议。显然，2018年总统选举对于哥伦比亚今后的走向非常关键。

最后，正如前文所述，哥伦比亚社会仍是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民众对武装冲突非常愤慨。这很正常，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应为建设和平付出更多努力，因为和平进程最终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哥伦比亚人是否能够原谅过去，着眼于未来，特别是在国家仍然面临着贩毒、犯罪团伙、腐败和不平等等其他重大挑战的情况下。结束武装冲突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重建和平的道路更加漫长和急迫，但这条路是值得坚持的。

（翻译 陈岚；责任编辑 黄念）